陈江华，邹煜恒，尹琴. 穷则思变？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1）：1-9.
CHEN Jianghua，ZOU Yuheng，YIN Qin. Poverty leads to change？ The influence of household-contracted land scale on farmers′ non-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LDS data［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2，21（1）：1-9.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2.01.001

穷则思变？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的影响
——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陈江华[1]，邹煜恒[2]，尹琴[3]
（1.江西农业大学 “三农问题”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45；2.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3.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省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45）

摘 要：农民创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而初始耕地资源禀赋是农民选择创业所面临的重要约束条件。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分析了家庭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有显著负向影响，承包地面积每扩大1%，农户非农创业的概率将下降1.44%；转入农地强化了承包地规模对非农创业的抑制作用，而农业机械应用有助于缓解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的不利影响，促进农户非农创业行为发生。为激励农户从事非农创业，应加大对耕地资源稀缺地区的创业扶持力度，同时要继续加大农机补贴力度，支持专业化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激发农民创业热情。

关键词：承包地规模；非农创业；农业机械应用；农地转入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2）01-0001-09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创业是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路径，对于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与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鼓励农民创业，国家层面相继出台了多项支持农民创业的政策文件。例如，国务院于2015年颁布《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深入实施农村青年创业富民行动，支持返乡创业人员因地制宜开展创业活动。随着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深入推进，国内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逐渐减弱，诱发大量返乡就业创业人员产生，因而加大对返乡创业人员的扶持成为创业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为此，2019年底，农业农村部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财政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返乡入乡创业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大返乡入乡创业政策支持力度，优化创业服务，进一步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在创业扶持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农民创业活动日趋活跃。截至2019年11月，全国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已达850万人，在乡创新创业人员达3100万人，乡村创新创业活力不断增强，大量催生各类新产业新业态。然而，农民创业活跃度与创业发生率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1]。华东地区的浙江与福建两省作为经济发达区域，农民创业积极性高涨，创业氛围浓厚，属于创业高活跃地区，而同为华东地区的江西省，农民创业热情相对较低，创业氛围较差，属于创业不活跃地区[2]。因此，进一步加强农民创业研究对于提高农民创业发生率、破解农民创业内外部约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也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收稿日期：2021-09-27 **修回日期：**2021-10-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农村经济转型的路径与规律研究”（71934003）；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的影响”（JD19045）
作者简介：陈江华（1989-），男，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与劳动经济。E-mail：jianghuachen@jxau.edu.cn
通讯作者：尹琴（1985-），女，编辑，硕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E-mail：32250618@qq.com

事实上，农民创业是农户在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下做出的家庭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农民创业活跃度高的浙江和福建与不活跃的江西在农地资源禀赋方面确实存在较大差异。2019年，江西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0.12公顷，而浙江与福建的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分别为0.03公顷与0.04公顷，江西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是浙江的3.6倍，是福建的3倍。土地资源禀赋相对更好的江西在农民创业活跃度方面远远落后于浙江和福建，这可能暗示农民创业领域也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即初始土地资源禀赋较好区域的农民由于家庭承包地相对更多，家庭收入相对更高，面临生存威胁的可能性更低，缺乏改变家庭生计模式的紧迫感，更可能安于现状，选择继续务农，而非承受风险去更换职业，脱离比较收益更低的农业；相反，初始土地禀赋较差区域的农民由于单纯依靠从集体所分得的承包地难以满足家庭基本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威胁，因而被迫选择进入风险更大但比较收益更高的非农创业领域就成为应对生存危机的主要选项之一。

虽然转入农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也是应对生存危机的另一重要选项，但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实施早期，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较低，非农就业机会非常缺乏，农民家庭生计主要依赖农地，使愿意扩大经营规模的农户面临无地可转的困境；即使伴随着农村劳动力持续外出非农就业，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紧张的人地关系矛盾，为农地流转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土地所承载的福利保障功能与农业的比较收益低的特性使农地流转市场发展未达预期，致使我国农业经营格局仍是以小农为主[3]。需要注意的是，政策规定二轮承包在一轮承包的基础上将承包期延长，此后中央多次强调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并长久不变，表明农村土地初始资源禀赋状况决定了当今的农业经营格局。因此，提出一个合理的疑问，“穷则思变”是否为农民从事非农创业的动因？在面对土地资源稀缺导致的恶劣的生存条件，农民是否倾向于选择从事非农创业来改变家庭生计模式？相反，较好的土地资源禀赋是否抑制了农民的非农创业热情而使其选择固守原有的生计模式？这都是亟待回答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改善农民创业扶持政策与优化创业环境，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学界目前主要从农户家庭人口特质、外部环境和创业资源三方面对农户非农创业展开了研究。创业的关键要素在于“人”，创业者特质论一直在创业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基于人口学和心理学的“天赋特质论”认为，心理因素对农民自主创业具有显著影响[4]。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角度考察创业者的“新特质论”则发现，教育年限与农户创业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5]，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学历和非学历教育的不足往往制约了农户创业决策，阈值以内的教育年限的提高能增加农户创业的概率[6]。郝朝艳等定义了农户的社会资本指数后发现社会资本水平高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非农创业[7]。已有研究表明，环境因素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较大，以区域经济和政策制度为代表的一般环境是中国农户非农创业的重要外部因素，其中区域经济水平有时对农民创业决策起到决定性作用[8]，除去直接的创业支持政策以外，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业补贴[9]、农地流转[10]和农村公共品供给等政策制度对农户创业行为也有影响[11]。此外，在创业资源、金融资源及其可得性方面，相关研究发现家庭金融资源约束和信贷排斥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户非农领域的创业活动[12]，而数字金融的使用可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和增加信息可得性，进而促进农户非农创业[13]。物质资源方面，Meccheri和Pelloni发现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农户倾向于造纸和矿产加工行业的非农创业[14]，而中国农户家庭承包耕地这项对非农创业决策具有独特和重要意义的物质资源，却很大程度上被学界所忽视，在研究中多将其纳入家庭特征变量进行控制，又因分析视角、研究方法和重视程度等导致的种种缺憾使得结果复杂多样甚至互相冲突[15]。

综上可知，学者们对农户非农创业影响因素研究的视角和结论不尽相同，但鲜有学者从家庭承包地角度探究其对农户非农创业决策的影响。为此，本研究将考察农户家庭承包地规模对其非农创业决策的影响，并探索其作用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承包地规模与农户非农创业

家庭资源禀赋是农户开展创业活动的前提条

件与核心要素，优越的家庭资源禀赋为创业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中国农户往往在耕地资源稀缺的约束下开展了以初始投资少、创新要求低和不确定性小为特征的生存—边缘型创业，并一度成为我国创业活动的主导类型[16]。随着劳动力迁移管制逐步放松，我国农户分化开始出现并不断加深，而这背后的一大推力是来自原始承包地资源禀赋的差异。在初始土地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承包地规模大的农户家庭收入相对较高，承包地能够承载家庭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面临的生存威胁小，甚至普遍存在小富即安的思想，排斥“离农”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从而抑制了这类农户创业的动力[17]。因此，承包地规模较大的农户可能基于路径依赖而选择继续务农。而在初始土地资源禀赋较差的地区，农户家庭可能由于承包地稀缺而易陷入贫困，倒逼其进入非农领域寻求拓宽家庭收入渠道的机会，从而提高其非农创业的可能。此外，农地具有人格化财产特征[18]，承包地规模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部门时所受的束缚强弱，小规模承包地对农户非农创业束缚作用相应较小[19]。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H1：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有负向影响，承包地规模越大，农户非农创业的可能性越低。

（二）农业机械应用对承包地规模负向影响农户非农创业的缓解效应

提升农业机械应用水平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农业经营规模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应用农业机械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家庭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单位土地农业劳动力投入量，而且通过降低劳动强度与难度使农户家庭原本无法承担传统农业生产的其他弱质性劳动力也能胜任农业生产活动，从而将家庭优质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释放出来，产生农业剩余劳动力，进一步促进家庭劳动力内部分工[20]。一方面，在城镇化与工业化快速发展背景下，非农就业机会可获得性不断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倾向于转移到非农领域以开拓新的家庭收入来源渠道，从而提高农户非农创业概率；另一方面，农业机械的应用及其应用水平提升有助于促进农户非农就业，进而增加农户家庭收入，为农户非农创业提供更丰富的创业资本，使农户非农创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创业资源，从而促进农户非农创业行为发生[21]。对于家庭承包地面积较大的农户而言，投入了相对较多的家庭劳动力在农业生产领域，对劳动力非农转移形成抑制，但通过应用农业机械，有助于缓解家庭承包地对劳动力转移的约束，促进劳动力非农转移，从而提高农户非农创业概率。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H2：农业机械应用水平提升，有助于缓解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的抑制作用。

（三）农地转入对承包地规模负向影响农户非农创业的强化效应

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稀缺，在土地均分的制度安排下，家庭承包地规模难以匹配具有务农相对比较优势的农户的农业经营能力，缺乏规模经济效应。在劳动力流动背景下，具有务农比较优势的农户倾向于转入外出农户的土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以增加家庭收入，使农业经营规模与家庭农业经营能力相匹配。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必然要求农户增加农业生产投资，这对非农创业产生挤出效应，不仅挤占了非农创业资本投资规模，可能使非农创业初始资本规模低于最低创业门槛要求，而且挤占了非农创业劳动力要素配置，使更多的家庭劳动力投入于农业生产领域。与此同时，农业生产投资增加意味着农地转入户拥有更多资产专用性较强的农业生产设备，导致其退出农业生产的门槛提高，对其进行非农创业活动形成较强的约束[22]。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H3：转入农地扩大经营规模将会显著增强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的抑制作用。

三、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库。该数据库每两年一次对中国城乡进行追踪调查，涵盖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以及教育、健康、社会参与和经济活动等众多主题，涉及的农户非农创业和农业生产经营等信息契合研究所需。2016年“CLDS调查”覆盖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共有401份村居社区问卷、14 226份家庭问卷和21 086份15～64岁劳动力人口个体问卷。为开展本研究将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进行合并，剔

除缺失值后共计7824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设置

1. 被解释变量。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有非农创业，具体指标为问卷中所对应问题："2015年，您家的经营性（店铺/代销点/家庭作坊等）收入总额大约为？"当家庭经营性收入总额大于0则定义为有非农创业，赋值为1，否则定义为无非农创业，赋值为0。数据显示，样本农户从事非农创业的比例为9.7%。

2. 核心解释变量。本研究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承包地规模，采用农户家庭承包地面积来衡量。样本农户家庭承包地面积平均0.48公顷，表明我国农业生产格局仍以小农为主。虽然政策层面一直以来在大力推进农地流转，鼓励土地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但由于禀赋效应的存在，农地流转并不顺畅，承包地规模仍是决定农户家庭农业收入的重要因素，而农业经营收入仍然构成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本研究从农户家庭承包地规模角度分析其对农户非农创业行为的影响。

3. 调节变量。本研究的调节变量为"农业机械应用"，以此探究其是否能够缓解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行为的抑制作用。农业机械应用状况采用"传统农耕"、"部分机械化"、"全机械化"来表示，数值越大表明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越高，越可能促进非农创业行为发生，从而缓解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的阻碍作用。

4. 控制变量。基于相关理论与借鉴已有研究，本研究选取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等三方面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到模型中。采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是否结婚、是否党员来测度户主个体特征。一般而言，男性较女性有更大的创业可能性，而年龄大的户主的创业意愿和能力都会下降；户主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是家庭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状况越好、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做出创业决策。户主的婚姻状况和党员身份与其社会关系状况密切相关，户主结婚能拓展其社会关系网络，而党员身份在农村本身就表征着一定水平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因而已婚和具有党员身份的户主更有可能进行非农创业。

采用家庭劳动力数量、农地转入、农地确权、社会资本来测度家庭特征。家庭劳动力越多，非农创业过程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创业资源，通过家庭自雇的方式可有效节约雇佣成本；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以礼物交换来维系与拓展社会关系网络，选择"礼品和礼金支出总额"能有效测度家庭社会资本状况，礼品与礼金的支出越多，表明家庭社会关系网络越丰富，有助于促进非农创业行为发生。转入农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可能抑制农户非农创业行为，数据显示，48.3%的样本农户转入了农地。农地确权提高了农地产权强度，可能通过促进农地流转对农户非农创业行为产生影响。

采用村庄地形、村庄交通状况来测度村庄特征。创业环境往往影响创业决策，村庄地形与交通状况分别是农户创业的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创业环境越好农户非农创业决策的可能性越大。

（三）基准回归模型构建

主要研究家庭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决策的影响，由于"是否非农创业"为二值虚拟变量，1表示农户家庭已从事非农创业，0表示农户家庭未有非农创业，故采用二元Probit模型，使用*Stata*13.0软件进行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NA_Entrepreneur_i = \alpha_1 Constracted\ Land_i + \alpha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NA_Entrepreneur_i$是第i户家庭是否进行非农创业；核心解释变量$Constracted\ Land_i$表示第i户家庭的承包地规模；X_i为控制变量，表示第i户家庭的户主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结婚、是否为党员）、家庭特征（劳动力数量、农地确权、农地转入、社会资本）、村庄特征（地形和交通）；α_1为待估参数，α_2则为控制变量对应的待估系数；ε_i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影响检验结果

表2报告了二元Probit模型对样本农户的承包地规模对非农创业决策影响的估计结果。模型一与模型二结果显示，"家庭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承包地规模对非农创业行为具有抑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是否非农创业	1=是；0=否	0.097	0.297
核心变量	家庭承包地规模	家庭从村庄分得的土地面积（公顷）（取对数）	0.734	0.063
调节变量	农业机械应用	1=传统农耕；2=部分机械化；3=全机械化	1.876	0.759
控制变量	户主性别	1=男；0=女	0.833	0.373
	户主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岁）	54.684	14.062
	户主受教育程度	1=未上过学；2=小学；3=初中；4=高中（中专）；5=大专；6=大学本科及以上	2.941	1.239
	户主健康状况	1=非常不健康；2=比较不健康 3=一般；4=健康；5=非常健康	3.576	1.04
	是否结婚	1=已婚；0=未婚	0.869	0.337
	是否党员	1=党员；0=非党员	0.142	0.35
	家庭劳动力数量	家庭劳动力人数（人）	2.537	1.655
	农地转入	1=是；0=否	0.483	0.499
	农地确权	1=已确权；0=未确权	0.504	0.500
	社会资本	礼品和礼金支出总额（元） （取对数）	5.315	3.872
	村庄地形	1=平原；2=丘陵；3=山地	1.589	0.798
	村庄交通状况	村庄交通道路硬化比例（%）	72.117	24.903

制作用，且家庭承包地面积每扩大1单位，农户非农创业的概率将下降1.44%，这表明家庭承包地面积越小，农户非农创业的概率会显著提升；相反，承包地规模越大，农户非农创业的可能性反而显著降低，研究假说H1得到验证。农户家庭初始承包地规模较小，且家庭收入主要依赖于农业收入，必然导致农户家庭生活水平处于村庄较低层次，陷于贫困之中。然而“穷则思变”，为改善家庭生活状况，在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增多的背景下，农户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开始向非农领域转移，甚至参与非农创业，寻找增加家庭收入的其他途径。对于家庭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而言，其家庭收入相对较高，家庭生活状况相对较好，缺乏改变现状的迫切需求，冒风险去创业的意愿不够强烈。因此，家庭经营规模较小的农户从事非农创业的可能性更高。

个人特征方面，户主年龄和健康状况分别在5%和10%的统计水平下对非农创业有显著负向和正向影响，与预期一致。户主年龄每增长1岁，其非农创业可能性下降0.1%；而健康状况每提高一个层次，其家庭非农创业可能性将提升0.82%。户主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对农户非农创业的影响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相对于未上学的户主，户主为具有本科学历的家庭从事非农创业可能性将提高18.8%。户主已婚对非农创业的影响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相对于未婚的户主，其家庭非农创业的可能性提高3.39%。

家庭特征方面，家庭劳动力数量对非农创业的影响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家庭劳动力每增加1人，其家庭非农创业的可能性将提高0.51%，与预期一致；农业机械应用对非农创业的影响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农业机械应用水平每提高一个层次，农户非农创业可能性将提高1.97%，与预期一致。

村庄特征方面，村庄交通和地形均是创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地形对农户非农创业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交通状况对非农创业的影响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村庄道路硬化比例每提高1%，农户非农创业的可能性将提高0.03%。

（二）农业机械应用的调节效应

借鉴Frimmel[23]和熊瑞祥等人[24]采用分样本检验调节效应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选择通过分样本回归来探索农业机械应用在承包地规模与农户非农创业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将从农业机械应用水平视角将农户分为较低机械应用水平农户与较高机械应用水平农户，其中将传统农耕与部分机械化归为较低机械应用水平，将全机械化归为较高机械化水平。由表3可知，家庭承包地规模对较低农业机械应用

表2 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影响的基准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边际效应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家庭承包地规模	-0.143***	0.0221	-0.107**	0.0494	-0.0144**	0.0067
户主性别			-0.0598	0.1300	-0.0081	0.0176
户主年龄			-0.0076**	0.0035	-0.0010**	0.0005
小学文化程度（以未上过学为参照）			0.0003	0.1300	3.81e-05	0.0176
初中文化程度（以未上过学为参照）			0.119	0.1380	0.0161	0.0186
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以未上过学为参照）			0.1940	0.1640	0.0263	0.0221
大专文化程度（以未上过学为参照）			0.4470	0.6070	0.0604	0.0820
本科文化程度（以未上过学为参照）			1.3880**	0.548	0.188**	0.0743
户主健康状况			0.0608*	0.0353	0.0082*	0.0048
是否结婚			0.2510*	0.1510	0.0339*	0.0204
是否党员			0.1520	0.1170	0.0205	0.0159
家庭劳动力数量			0.0380*	0.0229	0.0051*	0.0031
农地转入			-0.0772	0.1080	-0.0104	0.0146
农地确权			-0.0467	0.0753	-0.0063	0.0102
农业机械应用			0.1460***	0.0549	0.0197***	0.0075
社会资本			0.0360***	0.0114	0.0049***	0.0015
村庄地形为丘陵（以平原为参照）			-0.0482	0.0920	-0.0065	0.0124
村庄地形为山区（以平原为参照）			0.0508	0.1060	0.0069	0.0143
村庄交通状况			0.0024*	0.0014	0.00032*	0.0002
省份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064***	0.0324	-5.161***	0.357		
Pseudo R2	0.0091		0.0604			

注：*、**、***分别表示在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

水平的农户非农创业的影响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较低的农业机械应用水平下，农户家庭的承包地规模越大，其非农创业的可能性显著下降，这是由于越大的家庭农业生产规模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要素，导致过多的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从而抑制非农创业行为发生。但当农业机械应用达到较高水平后，承包地规模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户非农创业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农业机械应用水平提高能够缓解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的抑制作用，从而促进农户创业行为发生，表明研究假说H2得到验证。这是因为较高的农业机械应用水平，一方面，农户家庭农业生产能力较强，需要较大的经营规模来匹配农机作业能力，因而适当扩大承包地规模不仅不会阻碍非农创业，反而可通过增加家庭收入来为非农创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促进非农创业；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农业领域的劳动力投入，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从而提高农户非农创业的可能性。

（三）异质性分析

由表4可知，在未转入农地的条件下，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的影响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回归系数为负；在转入农地的条件下，承包地规模对农户家庭非农创业行为的影响在5%

表3 农业机械的调节效应

变量	较低机械应用水平		较高机械应用水平	
	回归系数	稳健标准误	回归系数	稳健标准误
家庭承包地规模	-0.0565*	0.0324	0.2340***	0.0892
户主性别	-0.0829	0.0787	-0.6310**	0.3020
户主年龄	-0.0101***	0.0021	-0.0204***	0.0074
户主受教育程度（小学）	0.1160	0.0891	-0.0235	0.3090
户主受教育程度（初中）	0.3170***	0.0931	-0.1020	0.3200
户主受教育程度（高中或中专）	0.2700**	0.1100	-0.00412	0.3680
户主受教育程度（大专）	0.4810**	0.2220	0.4040	0.6370
户主受教育程度（本科）	0.2700	0.2730	0.8882	0.6771
户主健康状况	0.0893***	0.0242	-0.0860	0.0656
是否结婚	0.1370	0.0856	-0.1530	0.3160
是否党员	0.2230***	0.0794	-0.1300	0.2420
家庭劳动力数量	0.0307**	0.0140	0.1790***	0.0499
土地转入	-0.0712	0.1100	-0.0863	0.1990
土地确权	-0.0911*	0.0508	0.1570	0.1770
社会资本	0.0357***	0.0067	0.0248	0.0242
村庄地形（丘陵）	0.0612	0.0577	-0.0786	0.2170
村庄地形（山区）	0.0638	0.0684	-0.0481	0.2310
村庄交通状况	0.0045***	0.0012	-0.0060**	0.0029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2050***	0.3930	-0.4300	0.8610
Pseudo R2	0.0873		0.1453	

注：*、**、***分别表示在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

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农户一旦转入土地，相对于承包地规模较小的农户，承包地规模较大的农户从事非农创业的可能性显著下降。在承包地规模不变时，转入农地使农户家庭农业经营规模扩大，要求在农业生产方面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对非农创业行为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抑制农户家庭非农创业，研究假说H3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中国家庭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从创业资源视角嵌入考察农户非农创业的影响因素，将家庭承包地这项关乎农户“命根子”的资源禀赋作为核心变量纳入农户非农创业决策模型中，探究农业机械应用和农地转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通过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和分样本回归的方法实证检验了农户家庭承包地面积对非农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穷则思变”的猜想得到验证，家庭承包地规模过小会倒逼农户开展非农创业活动，家庭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承包地规模每扩大1单位，农户进行非农创业的概率会下降1.44%。第二，农业机械应用缓解了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的抑制效应，其通过提高家庭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投入，促进劳动力非农转移，从而缓解家庭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的负向影响，对农户非农创业行为发生产生积极作用。第三，农地转入强化了承包地规模对非农创业行为的负向影响，扩大了农户家庭农业生产规模，导致农业生产投入了较多的劳动力与资本要素，形成了更多专用性较强的农业固定资产，对非农创业产生抑制作用。本研究不仅丰富和深化了有关农户非农创业的影响因素研究，而且揭示了家庭承包地规模较小的农户在促进非农创业发展中具有较强的动机。基于此，提出两点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农民创业的发展。

首先，加大人地关系矛盾突出地区的创业扶持力度，引导农民积极投身创业活动。人地关系矛盾突出地区土地资源稀缺，有限的土地资源无法支撑农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家庭

表4 农地转入的异质性影响

变量	未转入农地		转入农地	
	回归系数	稳健标准误	回归系数	稳健标准误
家庭承包地规模	-0.0745	0.0577	-0.201**	0.0986
户主性别	0.0058	0.142	-0.640	0.403
户主年龄	-0.0079**	0.0037	-0.00514	0.0142
户主受教育程度（小学）	0.00211	0.136	-0.388	0.448
户主受教育程度（初中）	0.152	0.143	-0.572	0.478
户主受教育程度（高中或中专）	0.147	0.175	0.284	0.512
户主受教育程度（大专）	-	-	1.494	0.973
户主受教育程度（本科）	1.416***	0.533	-	-
户主健康状况	0.0705*	0.0373	0.0427	0.114
是否结婚	0.184	0.154	-	-
是否党员	0.181	0.123	-0.167	0.515
家庭劳动力数量	0.0416*	0.0241	0.0402	0.0838
土地确权	0.0141	0.0802	-0.612**	0.248
农业机械应用	0.159***	0.0589	-0.123	0.183
社会资本	0.0373***	0.0120	0.0273	0.0382
村庄地形（丘陵）	-0.0431	0.0979	-0.210	0.356
村庄地形（山区）	0.0602	0.113	0.0120	0.369
村庄交通状况	0.00239	0.0015	0.00211	0.0042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	-4.852***	0.385	0.270	1.286
Pseudo R2	0.0641		0.1664	

注：*、**、***分别表示在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

承包地越少的农户从事非农创业的激励更强。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创业支持政策体系，加大对农地资源稀缺地区的创业扶持倾斜力度，为农民提供非农技能培训，为创业农民提供创业补贴，提高创业扶持政策的精准性，引导农民根据自身比较优势积极投身创业活动。

其次，在推进农地流转的同时，更加注重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通过土地流转推进农业规模经营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之一，但农地转入对非农创业形成抑制；农业机械化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时能够缓解承包地规模对创业的限制作用。因此，政府部门要继续加大农业机械发展支持力度，一方面要完善农机补贴政策，着力提高农机补贴标准，将更多适应性强的新型农机纳入农机补贴范围；另一方面要支持专业化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提高农机社会化服务可获得性，促进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对于地形不利于农机应用的地区，要加强宜机化改造力度，提高农机可应用性。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仅关注了农户拥有的耕地资源数量，限于数据可获得性，本研究未将承包地的质量条件纳入到分析框架，而耕地的质量对耕地产出率有重要影响，进而作用于农户非农创业行为。因此，今后还将深入探讨耕地资源质量对农户非农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参 考 文 献

[1] 李晓龙，冉光和. 农村金融深化促进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吗？——基于区域差异视角的实证分析[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20，41（3）：453-463.

[2] 杨晨. 中国各省区创业活动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D]. 杭州：浙江师范大学，2020.

[3] 韩俊. 以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为根本遵循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J]. 管理世界，2018，34（8）：1-10.

[4] 罗明忠. 个体特征、资源获取与农民创业——基于广东部分地区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2012（2）：11-19.

[5] 谭华清，赵廷辰，谭之博. 教育会促进农民自主创业吗?[J]. 经济科学，2015（3）：103-113.

[6] 董晓林，孙楠，吴文琪. 人力资本、家庭融资与农户创业决策——基于CFPS7981个有效样本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2019（3）：109-123.

[7] 郝朝艳，平新乔，张海洋，等. 农户的创业选择及其

影响因素——来自“农村金融调查”的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2012（4）：57-65，95.
[8] 朱明芬. 农民创业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杭州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2010（3）：25-34.
[9] 缪书超，钱龙，宋亮. 农业补贴与农村家庭非农创业——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21（3）：62-74.
[10] 苏岚岚，孔荣. 农地流转促进农民创业决策了吗？——基于3省1947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J]. 经济评论，2020，223（3）：60-87.
[11] 张青，张瑶. 农村非生产性公共品对农户创业行为选择的影响——基于微观视角的经验分析[J],财政研究，2017（6）：84-97.
[12] 卢亚娟，张龙耀，许玉韫. 金融可得性与农村家庭创业——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10）：89-99
[13] 何婧,李庆海.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创业行为[J]. 中国农村经济，2019（1）：112-126.
[14] Meccheri，Pelloni. Rural entrepreneurs and institutional assistance：An empirical study from mountainous Italy[J].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2006（18）：371-392.
[15] 杨子砚，文峰. 从务工到创业——农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形式升级[J]. 管理世界，2020（7）：171-185.
[16] Karin B，Johan G，Monica L. Provoking identities：entrepreneurship and emerging identity positions in rural development [J]. Entrepreneurship &amp；Regional Development，2016，28：1-12.
[17] 盖庆恩，朱喜，史清华. 财富对创业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三省农户的实证分析[J]. 财经研究，2013，39（5）：134-144.
[18] 罗必良. 中国农业经营制度：立场、线索与取向[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0，19（3）：261-270.
[19] 杨渝红，欧名豪. 土地经营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关系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J]. 资源科学，2009，31（2）：310-316.
[20] 陈江华，陈艳，罗明忠. 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分析[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1，20（3）：326-336.
[21] 朱红根，宋成校，康兰媛，等. 家庭农场经营代际传递有利于提高农场绩效吗？——基于种植业家庭农场实证分析[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1）：44-60.
[22] 田勇. 激励还是抑制？——土地权益变更与农村家庭创业[J]. 经济科学，2019（5）：117-128.
[23] Evans，W，R Schwab. Finishing high school and starting college：do catholic schools make a difference?[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00（4）：941-947.
[24] 熊瑞祥，李辉文. 儿童照管、公共服务与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来自CFPS数据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2017，16（1）：393-414.

Poverty leads to change？ The influence of household contracted land scale on farmers´ non-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LDS data

CHEN Jianghua[1]，ZOU Yuheng[2]，YIN Qin[3]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45，*China*；2.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193，*China*；3. *Jiangxi Academ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45，*China*）

Abstract：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and the initial endowment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s the important constraints in farmers′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making.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Labor dynamic survey（CLDS2016），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household contracted land scale on farmers′ non-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decision-mak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al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and the probability will decrease by 1.44% when the contracted land area expands by 1%；Transferred agricultural land strengthens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contracted land scale on non-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and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helps to alleviate the adverse impact and promote farmers′ non-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order to encourage farmers to engage in non-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we should increase entrepreneurship support in areas with scarce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continue to increas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ubsidies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ize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so a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nd stimulate farmers′ enthusiasm for entrepreneurship.

Keywords：Household contracted land scale；Non-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Agricultural machinery application；Farmland transfer

（编辑：程俐萍）